

大家谈人生

我演的角色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是配角,演了一辈子“小人物”。虽说都是“小人物”,但我自己不觉得“小”。我的老师赵丹曾告诉我,“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句话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从1945年下半年算起,今年已经是我进入电影圈的第八十个年头了。中国电影120年的历史,我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一大半。

1934年,我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很小就没了父母,随着哥哥生活。后来到北平拍戏,再后来到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我来到上海,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从那以后,一直没改过行。

11岁那年,我参演了电影《圣城记》,那是我的第一部电影。我在当中饰演的角色叫“小牛子”,后来,这部电影的男主角谢添把我的本名张学景改为“牛犇”。牛犇这个名字,从此就伴随了我一辈子。

曾经有人说我是童星,后来又说我是明星,这个我真的不敢当。只能说,我拍戏的年头比较久,经验多一些,创造过不少角色,给大家留下了一些印象。当年我进入电影界是误打误撞,就是为了吃饱饭。由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直至进入老年,我的不同人生阶段都被银幕记录下来,成为永恒的影像,一些银幕形象能被观众记住和喜爱,这已经让我很知足。

我很幸运,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多前辈电影人给予我关怀和帮助,我非常感激他们,敬重他们,更常常想起他们。他们不仅教会我演戏,还在生活上关心我,像照顾自己的孩子或弟弟妹妹那样照顾我,让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他们更在人品、艺德上影响着我,在精神追求上指引我人生的方向。我是苦孩子出身,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很短,可以说,剧本就是我的课本。如何待人接物以及对待这份事业的认识,都是从老一辈电影人的言传身教中而来。尤其让我难忘的是,他们教会我要热爱这份事业、对待事业要有责任心。既然从事了这

一个周末,我去逛城里的旧货市场,一家挂着“知味斋”匾额的旧书店吸引了我。一进店门,店主就笑着迎了上来,像对待老朋友似的推荐起他家的“宝贝”。“这件不错,您瞧一瞧。”他拿起一件“宝贝”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来一看,这哪算得上书呀?分明就是一本30多年前随处可见的“硬面抄”。翻开扉页,正中是用钢笔书写的3个仿宋字:“撷英集”。右下方是主人的落款,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摘下眼镜,将眼睛凑近,才勉强认出一个“刘”字。翻开内页,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本剪报集,每页纸上都贴着从报纸上剪下的文章,旁边还注明刊登的报纸名称及日期。

顿时来了兴趣。剪报集,我太熟悉了。30多年前,我在离县城10多公里的山村学校教书。当时工资少,无力购买书报,可偏偏又痴迷文学,对报纸副刊情有独钟,于是每个周日我都要进城一趟,加入街头的“阅报族”行列。

县城邮政局门口立着一排钢木结构的阅报栏,从侧面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大的“个”字。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准时将最新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当地的报纸张贴出来。才一会儿,阅报栏前就人头攒动。从衣着打扮便能看出,大多是已参加工作的职员,也有一些在城里求学的学生。我把这些一起在阅报栏前看报的人称为“阅友”。有时,“阅友”们会同时被一篇文章吸引,但大家不争不抢,里层的人看完后,便自觉腾出位置,外层的人再凑上去,那场景,就像在食堂排队打饭一般井然有序。

那排阅报栏,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获取新闻资讯的地方,更像是一处情感的慰藉所。每当读到优美动人的诗歌、散文,我都会沉浸其中,细细品味每一个句子,感受文字背后的精神力量。有时还会拿出隨身携带的笔记本,将那些触动心灵的语句摘抄下来。也有一些“阅友”,他们不摘抄语句,而是从腰间摸出小刀,看到心仪的文章,就沿着文章的边缘整块裁下。说起来,这种做法有点自私,不过,当时大家似乎都持宽容的态度,因为即使没人

诗歌征文启事

青春是时代跃动的脉搏,在每个追梦的足音里激荡;诗歌是精神不灭的火种,凝聚着对山河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为展现新时代青春风貌,以诗歌书写青春中国的蓬勃气象,即日起,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新媒体中心与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武汉大学共

份事业,就一定要有责任心把它做好。我一生都没有忘掉“责任”这两个字,一直怀揣着一份责任心去干事业。也正是“责任”二字,让我能够应对一辈子的工,乃至所遇到的各种坎坷。不管发生了什么,我始终没有放弃这份我一生所热爱的事业,并坚持到今天。

回想80年的演员生涯,拍戏时我曾经受过7次重伤,有的甚至危及生命。即便是这样,我仍然没有忘记“责任”二字。记得60岁时拍摄一部电视剧,剧中有一个场景需要骑着骡子,结果发生意外,我从骡子上摔了下来,造成胸骨骨折、胫骨骨裂,肋骨断了两根。当时的戏还没拍完,如果等痊愈,剧组再拉回外景地补拍,花费会很大。那时我疼得无法起身。于是,我打上了止疼针,在止疼药起作用期间,坐在椅子上(其实是被绑在椅子上)拍摄,就这样坚持下来,把镜头补拍完。之后,才让救护车把我送回上海继续治疗。

80岁时拍摄一部电影,剧情设计我有一场跳湖的戏,是救一个患自闭症的孩子。导演觉得我年龄大了,要找替身。我没有同意。我总觉得,既然主创人员把这样一个人物、一个场景写了出来,作为演员扮演了这个角色,就要以负责的态度真实地还原再现。

正是怀着一份责任心,我认真真地拍戏,不怕苦,不怕累。当演员就是要能吃苦。现在拍戏的条件好了,以前我们很苦,但再苦都没有怨言。我想,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一名演员,必须要有这样的责任心。因为是公众人物,所以更应做出一个表率。这样,你才能给粉丝的影迷、给那些喜欢你的形象的广大观众带来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在我90余年的人生中,有很多难忘的时刻。最难忘的是入党的那一刻。2018年5月31日,中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演员剧团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那天,我特地穿了一件红色的格子衬衫。站在鲜红的党旗前,我泪流不止。

我在青年时期受老一辈艺术家影响,就萌

去剪,这些报纸在第二天也会被新的报纸替换掉。

想到这些往事,我轻轻摩挲着手中这本泛黄的剪报集,心底竟生出一些暖意,我决定把它买下来。

回到家中,用消毒纸巾清除了封面上的污渍,小心翼翼地逐页翻看。突然,一篇题为《大爱之光》的文章跃入眼帘——那是一篇关于《傅雷家书》的读后感。为什么竟有熟悉之感?我凝神细想,想起了一段往事。

那是冬天的一个周日,我骑着自行车赶到城里时,已近傍晚。挨个浏览阅报栏上的文章,待看到省报副刊时,有一位“阅友”,肩上挎着帆布公文包,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准备剪下一篇《大爱之光》。我趕緊凑过去,用商量的口吻说:“能让我先看看吗?”他微微一愣,尴尬地笑了笑说:“好的!”我记得,那篇文章不过千余字,可我反复读了四五遍,足足花了十来分钟。他就一直静静地站在旁边等着,直到我表示看完了,他才开始剪报。因为这件事,我们聊了起来,这才得知,他是城区某小学的语文教师,人称“老刘”。

后来我还碰到过老刘几次。因为这篇《大爱之光》的影响,我专程去新华书店购买了《傅雷家书》。其时我正处在人生的艰难时期,迷茫与困惑如影随形。傅雷先生在书中所讲的为人处世、读书立业的道理,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这些饱含智慧的语句,如同一股股清泉,滋养着我,涤荡着我。

“难道竟有这样巧合的事?”我想起这本剪报集的主人正是姓“刘”,一时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这本剪报集就是一种缘分的体现,带着暖人的温度。

我不想也不忍再去探究“撷英集”为何流入市场,而是满怀诚敬地把它摆在了家中书架最显眼的地方。

同举办诗歌征文活动,诚邀广大青年诗歌爱好者踊跃参与。

本次征文要求作品为30行以内的现代诗,情感真挚、语言清新,通过诗句勾勒新时代青春印记,彰显踔厉奋发的青春风华。作品须为原创,未在任何媒体公开发表,作者年龄45周岁及以下。截稿日期为2025年10月31日,优秀作品将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人民日报客户端刊登。谢绝一稿多投。

来稿请发dadi@peopledaily.cn,邮件主题标明“诗歌征文”,并附联系电话。

“角色虽小,戏大过天”

牛 犇

生了入党愿望。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跟着老一辈演员们到香港的大屿山上,用身体拼成五角星的图案。他们告诉我:中国人民解放了!中国共产党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是共产党解放了穷人和老百姓,给了我们新生活。我当时听了还只懂非懂,他们又说:“从今以后,你回家就有饱饭吃了。”

刚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我还不到18岁。我在上海举目无亲,我的亲人就是党组织。我敬佩的那些老演员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心里,入党是很神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是很高的。和老一代优秀的演员相比,觉得自己差距太大了。我不断给自己鼓劲儿:没入党,也一样为党和人民作贡献。

这些年来,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和民族发展欣欣向荣,我打心底里钦佩,要求入党的愿望越发强烈起来。

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份入党申请书,我写了几几乎一整夜。很多内容的年份必须准确,等查清楚都到半夜了。我在桌上趴着睡了两个钟头,醒来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就继续写。我没有打草稿,这些话我搁在心里已经大半辈子了。我说:“我的年龄已经80多岁,为党工作,就算不睡觉也不会太长,我一定要珍惜。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老演员秦怡。她是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写好字条:“牛犇是个好同志,是个好同志。我愿意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相信他也会做得很好。”

也许今天有的年轻人不理解,我都到了这个年纪,为什么还如此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我们成长的年代不同,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确实是有“代沟”的。

我出生于旧中国,小时候受到进步文化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知道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就萌生了朴素的革命理想。新中国成立后,我跟随进步电影人从香港回来建设新中国。我见到过



油画《乡村公路》,作者沈行工,中国美术馆藏。

横铺的园艺师

陈诗悠

在大山深处的横铺,有一位年轻的园艺师。他叫曹阿玲,长相帅气,性格腼腆。横铺街上的人们开店,卖猪肉、卖百货、卖早餐。曹阿玲不卖东西,只在自己的屋檐摆满了盆栽,在街道两旁的空地上种满了花草。

最开始,我不认识他。但每次走到街上,都被他种的花草深深吸引。记得一年春天,他家门前的白山茶开了,那白中染着淡绿的娇柔,特别讨人喜欢。当我走进曹阿玲的家门,想讨要一枝时,坐在堂屋里的他也正好看到了我。我只好尴尬地问道:“你好!我可以摘一枝你家的茶花吗?”他爽快地答应。

夏天时,他种的绣球花,在道路两旁开得热烈而静美。曹阿玲见我喜爱绣球,就主动走过来,问我喜欢哪一枝,他给我剪下来。他一边剪花一边告诉我,绣球可以扦插,把它们插进土壤,慢慢就会发出根来。就在这些摘花和种花的来往中,我和曹阿玲逐渐熟悉了。只要聊到花草树木,他会立马眼睛放光,语言如打开闸的水,停也停不下来。他屋门前,那一盆盆姿态灵动的盆景,被他养得古典雍容、沧桑挺拔,为山中夏天平添诗一般的缠绵和悠远。

也常常有山外人,慕曹阿玲之名而来,欣赏完他精湛的园艺后,再买下一些花草。买花草的人越来越多,他那小小的庭院已无法施展开来,他就在自家田地种了起来。一丘种山茶,一丘种杜鹃,还有一丘种上辛夷花。白色的辛夷最夺目,如一群群飞舞的白鸽,在光洁的枝丫间鸣唱。

有一段时间,曹阿玲种植花草的身影突然在山中消失了,那些花草似乎也跟着沉寂了。问村民说,由于他的园艺技术好,人又勤奋,被政府派去镇上做园艺设计和花草种植了。我们真为他高兴。

半年之后,曹阿玲完成镇上的工作,回到山中。他不但重新培育那些已荒芜的花木,还带领村子里很多人一起种起了花草树木。后来,经常又看到,一辆辆从山外开进来的卡车停在山间道路上,一群群村民在花田里挖花木,卖桂花树,卖红豆杉,卖杜鹃花。那些陌生的外地卡车,把山中的花树,一车又一车运了出去。

横铺的园艺师越来越多,山田中的花草也越种越多。如今的横铺,就如同一个花的海洋,四季不断绽放着花朵。除了山中的野花外,最打眼的还是园艺师们在山田间种的花树,那一丘丘风姿绰约的田中花树,总是怒放不止;壮观而热闹。

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幸福留给别人。我一生向往光明、追求进步。对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有着最切身的体会。我经历过旧社会的屈辱、战乱和贫穷,后来迎来了新中国,再后来迎来改革开放,直到今天进入新时代,过上了这么好的日子,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加入中国共产党确实是我一生的追求。现在,我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没有辜负老一代电影人对我的期望,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2018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信中勉励我:“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这封信给了我莫大的褒奖和肯定,我看了无数遍。我很荣幸,也深深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我想,这封信是给所有坚持正确艺术观、不忘初心的文艺工作者写的。

我今年91岁了,还在拍戏。去年,我参加了电影《陌生家庭》《靠近我 看见你》《爆款好人》、电视剧《曙光》等拍摄。前不久,我刚刚去了北京、河北等地拍一部电影的外景,这部作品讲述的是登上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舞台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孩子们的故事,我在当中扮演一位爷爷……我想,哪怕走不动了,哪怕没力气了,我也要为观众、为时代再出一份力,要在有生之年,多拍几部有意义的片子。

只要有好的剧本,有社会意义,我就去演。我不挑角色大小,不计较镜头多少,也不问给多少酬劳,就是要尽一个演员的本分。正如那句老话:角色虽小,戏大过天。多拍戏,拍好戏,让我的人生经历和艺术生涯对社会有用,尤其是对年轻人、年轻演员来说有点意义,这才是最重要的。

回望人生,我深深感到,艺术应该为人民服务,电影的方向永远是为人民的艺术。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中有很多宝贵的传统,老一代电影人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品质,我们应该将这些传承下去,不懈地为人民而创作。



油画《乡村公路》,作者沈行工,中国美术馆藏。

杂克尔

王 族

与朋友聊天,听他提到“杂克尔”,一时觉得熟悉,却想不起在哪见过。等弄清楚杂克尔就是玉米面饅后,便想起我20多年前在新疆和民吃过。

杂克尔,出了和田便很难吃到。和田的玉米面磨得细,多用凉水和面,掺些洋葱末、南瓜条、肥羊肉丁等烤熟,便是杂克尔。杂克尔有玉米面的天然香味,刚出炉趁热就着核桃仁吃,口感更妙,与酸奶、羊肉汤、沙枣汤等也特别相配,是普通家庭常备的干粮。

一次,和田的一位朋友请客。我们乘车穿过一片白杨林,又穿过一片红柳林,最后又在一大块玫瑰花地边穿行。大家正看得高兴,那朋友却说:到了,下车吧。那顿饭有用铁盒焖出的羊肉、红柳烤羊肉串、河水炖出的鱼汤、放了葡萄和红枣的抓饭、清炖羊肉等,大家吃得颇高兴。吃到最后,女主人端上来一盘黄灿灿的饼子,郑重其事地说,请大家吃个杂克尔,回去的时候有力气走路。我掰下一块尝了一口,表皮脆,里面甜而酥软,越嚼越香。主人说杂克尔是用玉米面做的,他父亲在饅坑跟前忙了一下午,才烤出这一盘。

几天后,我在墨玉县见到人们在饅坑前打杂克尔。他们用的是很细的玉米面,掺和剁碎的皮牙子、南瓜和肥羊肉,以起到调味作用,但不影响玉米面的天然香味。做杂克尔用凉水和面,先揉搓,再用巴掌拍成饼状,便可入饅坑炙烤。我和饅坑边忙碌的农民说起杂克尔,他接连说了四个“最”:杂克尔最顶饥耐饿,最适当地干活的人欢迎,就着酸奶、羊肉汤和沙枣汤最好,刚出饅坑后就着核桃

能耐、能耐,既有能,又有耐。能,指的是本事、水平、才干,往往以知识、学问、悟性为根基;耐,指的是恒心、韧性、定力,每每以信念、毅力、心性为支撑。能是向外突破的锐气,可以像利剑那样劈开顽石;耐是向内沉淀的韧性,能够像青松那样坚韧不拔。

能与耐辩证统一,二者既不可或缺,也不能偏废。无耐之能或如流星一般短暂,无能之耐恰似枯木一般僵化。有能无耐,能就无以依托,持续干事就没有保证;有耐无能,耐就没有根基,成就事业就无从谈起。故而,能需以耐支撑,耐需以能破局。用耐涵养能的根基,用能为耐赋予力量,才能使事业兴旺发达。好比竹子生长,既要有势不可挡的破土,又要有经年累月的扎根,如此,方能秀拔云天。

中国古代匠人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仅手工雕刻一个细致蜡模就需耗费数月。清代玉雕“密勒塔山五大高治水图”,玉料重万斤,工匠轮班雕刻,每日仅推进少许,整个工程耗时数年,遂成稀世珍宝。当代“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从构想到建成历时22年,科学家们从建设选址到球形反射面方案,处处反复论证,终于成就独一无二的国之重器。学识渊博、才能卓越,甘愿几十年甚至一生只做一件事,还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才能成为能耐兼备、德才双优的大国栋梁。

然而,毋庸否认,当下也有不少人有无能耐或能强耐弱,他们总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裹挟着、推动着,静不下心来,耐不住寂寞。有的官员上任伊始便猛烧“三把火”、大砍“三板斧”,恨不得一夜之间出政绩、出奇迹;在一个单位干上几年就盼着提升,没提升就焦躁难耐,甚至为了提升而不惜数字造假、政绩掺水。有的学者坐不住冷板凳,不愿做扎扎实实的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喜欢吹糠见米、立竿见影,渴望一举成名、一鸣惊人,甚至不惜学术造假、成果作伪。有的企业一味追求利润,只因赚快钱、快赚钱,总想轻投投机取巧、不愿艰苦创业创新,甚至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凡此种种,都是追求短期功利的表现,恒心和韧性不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有能无耐,犹如利剑无鞘,或会自伤。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徐渭才华横溢,诗文书画俱佳,更通晓兵法谋略,可因屡试不第、命运多舛而精神崩溃,最后疯癫自残,抱恨而终。英国科学家弗莱希曼和美国科学家卢斯急于发表研究成果,在未充分验证实验可重复性且数据存在漏洞的情况下,公然宣布实现冷核聚变,一时引起全球轰动,可后续实验室无法复现结果,最终认定其为“科学乌龙”。揆诸现实,此类因急功近利而反噬自身的事例,屡见不鲜。

看来,真正的能耐,当如钱塘江湖——既有汹涌澎湃的能量,又有按月潮流的耐心。须知,成长不是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千锤百炼的锻造;成功不单是百米冲刺的奔标,更是铁杵成针的修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锐意进取而又持之以恒的人,都在为“能耐”二字书写新的注脚。

仁吃,口感最独特。我默默记下这四个“最”,下次碰到杂克尔,我也是个会吃的人了。

离打杂克尔的人家不远,有一个大院子,颇有些老院风貌,尤其是院子里的梨树,没有几十年恐怕长不成那么粗壮,结出的梨子更是比拳头还大,朋友摇晃梨树便落下几个,用手捧着却不知如何下口。出了大院,见附近有一水磨,名曰“二十八盘”,朋友介绍说先前此处有28个水磨,时过境迁,只剩下眼前这一盘还在使用,但人们仍用“二十八盘”称之。水磨,顾名思义,用水的作用推动木轮,再让木轮带动两片石盘转动,玉米粒便被磨成细细的面粉。我抓了一把细看,感觉在昏暗的磨房中,玉米面泛出金黄。问正在磨面的人,现在用水磨的人多吗?他答

曰不多,也就是打杂克尔的人来这里磨面。噢,只要杂克尔存在,这水磨便不会消失。

听说有一人专门负责看管水磨,那天他去了别处,我们没有见到。晚上吃饭时听到他的一件事,说是他有一天去山中放羊,天气突变,下起大雪,他担心羊群在大雪中迷路走散,便将羊群赶入一个山洼避雪。他眼看那雪越下越大,不免有些恐惧,担心自己和羊群无法挨过大雪之夜。后来他无意间想起打杂克尔的饅坑,便捡来柴火把地上的沙子烧热,然后在上面又盖一层沙子,便和衣躺了下去,抵御了寒风大雪。原来,杂克尔在美味饱腹之外,也包含着生活智慧。



油画《乡村公路》,作者沈行工,中国美术馆藏。